

七夕乞巧习俗与 古代女性文化心理

蔡丰明



中国的七夕节是一个伴随着牛郎织女的传说一同发展起来的传统节日，其滥觞大概是在汉代，晋代葛洪的《西京杂记》有“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的记载，说明当时七夕穿针习俗已经开始流行。随着时代的推移，七夕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普遍奉行的一个重要节日，并且受到了广大民众的喜爱。

在七夕诸多的节俗活动中，“乞巧”是一项最为有趣、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主题活动，它的主要表现方式，就是通过祭祀、占卜、祈求等各种手段，来证实自己心灵手巧，满足自己渴求聪明伶俐的心理期望。可以说，在中国千百年来的历史长河中，正是这种“乞巧”的独特形式，促成了七夕节中最有生命力的因素，塑造了七夕节中最为光辉灿烂、鲜明独特的文化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七夕乞巧活动与女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女性不但是乞巧活动最为虔诚的信奉者与崇拜

者，而且也是乞巧活动的主要推行者与承载者。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并非出于女性群体对这一习俗的特殊偏爱，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观念与礼仪制度，造成了女性对于七夕乞巧习俗的特殊心理期待，培养了女性独特的七夕乞巧情结。

七夕乞巧习俗与古代女性关系

中国古代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大量的节日，例如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冬至等等。但是在这些节日中处于前台的，几乎都是男性。男性主持着各种节日中的祭祀活动、庆典活动，执掌着各种节日中的礼节往来、游娱玩乐。尤其是节日中的祭祀活动，一般都必须由男子来主持，妇女甚至连参与的资格都没有。唯独七夕节是个例外。到了七夕这一天，妇女们便成了节日活动的主宰，节日活动中方方面面的事务，似乎都与妇女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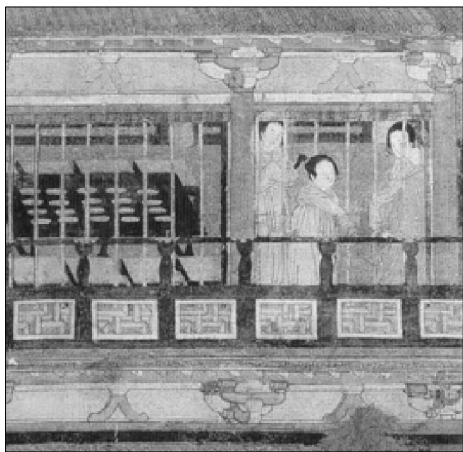
关。或许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们常把七夕节叫做“女儿节”“少女节”。

七夕节与女性关系的密切程度，在这一节日的主题活动——“乞巧”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无论是参与对象、时间安排，还是活动的内容形式，七夕乞巧习俗无疑都带有浓浓的“女人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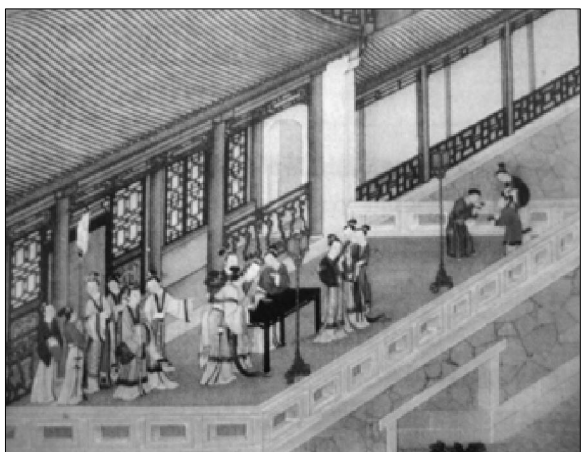
从参与对象来看，七夕乞巧活动的主体为女性，这一点毋庸置疑。在较早记载七夕习俗的《西京杂记》中，就已经明确指出当时参加乞巧穿针活动的是宫廷中的彩女；在《开元天宝遗事》中，也有“宫中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的记载。宫女们长期被幽禁在宫廷中，生活的寂寞，情感的空虚，使她们对七夕穿针之事甚感兴趣。至唐宋时，一些帝王为了讨取她们的欢心，甚至还经常在七夕时搭设彩楼，供宫女们穿针乞巧玩乐。除了嫔妃宫女以外，一个更为庞大的七夕乞巧群体是民间妇女。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七月七日，为

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铜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这些记载充分反映了古代民间女子在七夕节中穿针引线、祭星乞巧的情景。许多民间女性虽然家境贫寒，但是七夕穿针乞巧之事却仍为她们生活之要务，每至此时，她们便要虔诚地在月光下穿针引线，显示才能。这一上下层女性共同参与的节日习俗活动，构成了一种浓郁的女性文化氛围，展示了中国传统节庆文化与女性生活之间的独特关系。

近年来民俗调查方面的一些资料，为中国古代七夕乞巧活动的参与对象主要为女性的事实找到了更为充分、翔实的依据。例如过去陕南一带山村，到了七月七日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泡豆芽。晚上，全村中年以下的女子都带上自家泡的豆芽聚集在一家院子里。星光下供奉着一尊西天王母娘娘像。妇女们向娘娘像跪拜，诉说一年来的磨难，祈祷来年的幸福、和顺。西天王母娘娘像是用一只木桶和一只葫芦，穿戴上老



《唐宫七夕乞巧图》(局部) 美国大都会美术馆藏



楼台乞巧

婆婆的衣饰临时做成的。虽然样子看起来有些滑稽,但却不会影响妇女们的热情,她们照样虔诚地跪拜、祈祷。所有在场的妇女,推选出一位最漂亮、针线活做得最巧,并且没有出嫁的女孩儿作为主持人,由她把大家带来的豆芽分给每个人。这豆芽被称作“巧芽”。特别是有女孩儿的人家,更是精心地将这些“巧芽”带回家,做成菜给女孩子吃。这样,这女孩儿长大后,就会变得和大家推选出来的那位女孩儿一样漂亮,一样手巧,一样可爱(吴凯:《“七夕”话“乞巧”》,《中州统战》2003年第1期)。

从时间特点方面来看,七夕乞巧习俗主要是在农历七月七日进行,而这个日子对于女性来说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孔雀东南飞》诗云:“初七及下九,嬉戏勿相忘。”这里所谓的“初七”与“下九”,是传统社会中两个独特的妇女节日。其中“下九”是指每月的十九日,而“初七”正是指每年的七月初七这一天。每逢这两个时日,妇女们便可以在月下相聚嬉戏,甚至于“忘寐达曙”,游戏到天亮。



七夕穿针 《吴友如画宝》

为什么“下九”与“初七”会成为古代妇女的节日?原来,按中国古代阴阳五行的说法,男女性别有阴阳之分,男为阳,女为阴;而自然数字也有阴阳之分,其中单数为阳,双数为阴,而“九”则是阳数中的极数。古人认为如果遇上有“九”的日子,就会阳气大盛,因此必须要以阴气来调和,而“下九”正是在这种阴阳调和观念下出现的妇女节日。

另外,逢有日和月两个单数重合的日子,如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等,也被古人认为是阳气大盛的日子,同样需要有阴气来调和补充,七月初七,正是在这种阴阳调和观念下形成的一个节日。由于希望用阴气来调和阳气,因此这个节日对于妇女来说便有了独特的意义,成为妇女可以参与游乐、祭祀、社交等各种社会活动的重要契机。当然,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传说故事,也是促使七月七成为一个妇女节日的重要原因。

从活动内容与形式方面来看,乞巧习俗也与女性有着密切关系。众所周知,乞巧习俗活动中最为基本的内容是穿针,这一习俗自汉代形成以来,一直延续到现在,始终没有改变,而穿针之举显然与传统女性生活方式有着密切关系。除此以外,诸如送彩线、剪窗花、制巧食、染指甲等,也都是与女性生活密切相关的习俗形式。例如过去江南地区的妇女每至七夕节时,就要将平日刺绣用的红绿丝线扎成一束束丝束,送给自己未出嫁的小姐妹。苏州一带的女性在七夕乞巧时要制作一种特色食品,叫做“巧果”,制法是用面

粉和糖拌匀，揉结实，再切成宽二寸左右的条形，扭成苕结的形状，然后放入油锅中余熟，冷却后食用，据说吃后可以得巧。而鲁西南地区的女性则喜爱把针、钱、枣等物包进饺子里，如果谁能吃到包针的饺子，就象征能得巧，吃到包钱的饺子，就意味着得到财富，吃到包枣的饺子就象征早婚得子。也有一些地方的女性到了七夕节时要捏制一些织女形象的酥糖，俗称做“巧人”、“巧酥”，出售时又称为“送巧人”，此风俗在一些地区延续至今。

七夕乞巧习俗所反映的女性文化心理 及其特点

大量的乞巧习俗，表现了古代女性在七夕节中独特的行为方式，当然，在这些独特的女性行为方式背后，也蕴藏着她们独特的文化心理与行为动机。古代妇女从事的主要工作是纺织、缝纫。而七夕节中女性们之所以对乞巧习俗感兴趣，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为了满足她们缝纫织作技术方面的心理需要。

1. 希望展现自己在缝纫织作方面的才能。

唐代诗人祖咏的《七夕》诗，就反映出当时女性在七夕穿针时迫切希望胜过他人的心理状态，诗云：“向月穿针易，临风整线难。不知谁得巧，明旦试相看。”对着月亮穿针尚属不易，在风吹动下整理丝线当然更加困难，但是姑娘们却并不在乎这些，因为她们正是想通过这些手工艺的展示，来证明自己织作才能的高超精湛，胜人一筹。

2. 希望验证自己在缝纫织作方面的天赋。

唐代崔颢的《七夕》诗中，曾形象地描述了唐代长安七夕节女性们穿针乞巧的风俗，诗云：“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仙裙玉佩空自知，天上人间不相见。”长安城中家家户户的少女少妇，在七夕节时都要持针线、供瓜果、摆香案，向织女乞巧，其目的也正是为了想要证实自己在针线活计方面的天赋与才能。通过观看蜘蛛结网的情状来占卜自己在针线织作方面的天赋，也是一种女性们在乞巧时经常采用的方式。南朝时的做法是将蜘蛛放在瓜上，让它在瓜上结蛛网，然后根据蛛网的密与疏来推测自己是否得巧。唐代时，皇宫中也十分盛行这种习俗，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当时每至七夕节，宫女们便要“各捉蜘蛛闭于小盒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明清时期，女性们在过七夕节时又开始流行起一种新的乞巧方法，那就是通过观看针在水中的投影来验证自己的针线织作水平高低，这叫做“丢巧针”，又叫做“督巧”。《帝京景物略》卷二《春场》记载：“七月七日许丢巧针，妇女曝盎水日中，顷之，水膜生面，缔针投之则浮。则看水底针影，有成云雾、花头、鸟兽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谓乞得巧。其影粗如槌，细如丝，直如轴蜡，此拙征矣。妇或叹，女有泣者。”这种卜巧方法在《帝京岁时纪胜》和一些明清方志中均有类似记载，可见流传已久，覆盖面很广。另外明清时期在南方一些城



丢巧针 《吴友如画宝》

市，女子七夕“折细草，取浮水中，视其下所现之影状如何”，北方农村“用盆水浮豌豆芽，观其所示之象，定女性工拙”。这些习俗方式，实际上都是古代女性们为了验证自己在针线织作方面的才能与天赋而采取的占卜与测试行为，以满足她们对于针线织作技术的心理渴望与心理寄托。

3. 希望求取自己在缝纫织作方面的灵性。

女性对于求取缝纫织作技术的迫切愿望，不仅表现在她们不断采取各种手段来展现与证明自己在这方面的才能，而且还表现在她们对于缝纫织作技术的迷信与崇拜。因为织女在传说中被认为是一位心灵手巧、织作技术极为高明的仙女，所以每逢七夕时，就有成千上万的妇女向其祈拜许愿，以求获得织作技术方面的灵性。

除了祭拜织女外，中国古代的女性们还经常采用其他方式来求取缝纫织作方面的灵性。例如以前浙江农村七夕节时妇女们喜爱用脸盆接露水，传说七夕节的露水是牛郎织女相会时的眼泪，如果抹在眼上

和手上，做起针线活来可使人眼明手巧。江浙一带的妇女七夕节时还要制作各种巧果食品以求得巧，多用糯米，放糖，油炸成各种小的花果子，认为吃了以后能提高自己的女红手艺，因此当地家家户户节日必备。在胶东地区，七夕节还有吃麦芽糖饼的习惯，人们用新长出来的鲜嫩麦芽加糖和面粉，做成各式糖饼，俗称巧果子，传说七夕对月而食，可使人生巧。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女性的七夕乞巧心理，十分集中地表现在追求缝纫织作的技巧方面，它们充分反映了妇女们迫切希望通过各种行为方式，来展示自己的缝纫织作才能，证明自己的缝纫织作天赋，以使自己获取缝纫织作灵性的情感需求与心理取向。

古代女性乞巧心理的形成原因 与社会文化意义

古代女性为什么会对七夕乞巧与祈求缝纫织作之事有着如此强烈的心理渴求？为什么会对七夕节中穿针试巧、结网卜巧之类的习俗活动表现出如此热衷虔诚，甚至迷信崇拜的态度？内中原因主要是与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礼仪制度、道德规范及其对于女性行为与心理上的约束与影响有关。中国悠久的农耕文明生产方式，很早就对男女两性作出了不同的分工，男性主要承担占据家庭经济主导地位的农业耕作劳动，而女性则主要承担占据家庭经济辅助地位的家庭手工业与畜养业劳动。这种源远流长的男女分工传统，不但构成了

古代中国“男耕女织”型的社会经济模式，而且也确立了男女社会性别角色的差异。

在“男耕女织”生产模式的影响下，缝纫织作成了女性所承担的一项最为主要的社会劳动，同时也成为女性日常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她们每天都从事着纺织、缝纫、刺绣等各种被统称为“女红”的家庭手工业劳动，并对这种劳动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从这种意义上看，七夕节中女性们虔诚地向织女乞求织作缝纫方面的技艺，以使她们更好地完成社会与家庭所赋予的责任，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然而值得重视的是，七夕节中女性对于乞巧习俗的热衷及其在实施这些习俗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虔诚与崇拜态度，并不仅仅是男耕女织这种自然经济方式作用于女性心理的结果，中国封建礼仪制度与道德规范对于女性社会行为取向与社会性别角色定位的限制，更是直接造成了妇女们对于缝纫织作之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心理需求。为了适应男耕女织与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生产分工模式，封建社会中形成了一整套极为严格与精细的礼仪制度与道德规范，把女性的行为举止、思想观念牢牢限制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桎梏之中，致使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演变成一种完全丧失独立人格的，只知“织红组绠、酒浆醯醢”之事的庸碌之辈。在汉代班昭所著的《女诫》中，明确说明了妇女所必须遵从的“四德”的具体内容。后来作为规范女性言行举止

的通俗读物《女儿经》，则更加明确地描绘了女性在日常生活与家庭劳动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光梳头，净洗面，早到闺房做针线。绣鸾描凤刺鸳鸯，等闲莫与人相见。”

在这种严格的封建礼教与道德伦理规范的制约下，缝纫织作成为评判女性道德风范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同时也成为确定女性社会文化身份的一个重要条件。只有有了这方面的本领与优势，女性才能在家庭中立足生存，在社会上赢得美誉，否则，便会受到家人与社会舆论的谴责，甚至被赶出家门。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被遣归，其原因就是因为织作不如婆婆之意。

由于封建社会对于女性的缝纫织作方面的要求十分苛刻，因此许多少女在出嫁前总是忧心忡忡，生怕嫁到夫家后不能满足丈夫与婆母的要求，以致遭到冷落甚至遗弃。这正是大量古代女性，尤其是未出嫁的少女在七夕节中虔诚祭拜拜月、乞巧求艺的真实心态反映。唐代诗人杜甫当时



乞巧奠 《清俗纪闻》

已经清楚看到了这一点，他在《七夕》一诗中写道：“嗟尔未嫁女，秉心忧忡忡。防身动如律，竭力机杼中。虽无姑舅事，敢昧织作功。”原来是这些未嫁的少女担心婚后的生活能力，所以不能不抓紧学习女工，虽然尚没有姑舅之间的矛盾，也不敢不练习织作。这正是男耕女织小农家庭中女性的实际思想状况。

由此可见，古代社会中女性们之所以对乞巧以及祈求缝纫织作技艺的习俗活动如此热衷，与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礼仪制度与道德规范有着密切关系，正是古代社会中那种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三从四德”的道德规范，严格约束的妇女礼制，使广大女性与缝纫织作事务之间建立了不解之缘。

七夕乞巧习俗行为以及蕴藏在这些习俗行为背后的女性文化心理，虽然是封建礼仪制度与封建道德规范的产物，带有鲜明的男尊女卑、“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色彩，但是从更为宏观的文化史角度来看，这些习俗及其心理表现对于社会发展与女性文化的意义却并不是完全消极的，它的积极意义至少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 表现了传统女性对于争取家庭地位，获取社会身份认同的积极态度。

七夕乞巧行为表面上来看是一种古代女性无法改变社会现实，只得屈从封建伦理束缚的表现，但是在更深层次的意义，却反映了传统女性对于争取家庭地位与获取社会身份认同的积极态度。在不可能改变整个封建社会对于女性严格束缚的

条件下，开发自己的心智能力，学好缝纫织作的看家本领，便成了女性们在当时社会中为了争取家庭地位与社会身份而所能采取的唯一途径。只有掌握了过硬的缝纫织作本领，她们才会在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条件下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为自己在家庭中和社会上得到广泛的认可、肯定、赞誉而创造一定的有利条件。

2. 表现了传统女性对于聪明能干、平安和谐的人生终极目标与理想价值的积极追求。

七夕乞巧行为虽然是封建伦理道德的产物，但是它在文化学上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遵从社会道德规范这一狭小的范畴。对于传统女性来说，七夕乞巧行为中往往寄托了她们美好的生活理想，体现了她们与农业文明社会相适应的，对于聪明能干、平安和谐的人生终极目标的追求与向往。为自己的丈夫缝缝补补，为自己的家庭织作忙碌，这些虽然只是极为平常简单的小事，但是在传统社会中许多妇女的眼里，它们却成了维护家庭和谐，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重要方式，只有依靠它们，才能求得家庭稳定，亲人平安，生活美满，心情快乐。因此，在七夕乞巧的过程中，她们往往便将自己的这些人生理想、愿望、期待全部融入其中，将其看成是自己人生价值目标的一种重要实现。这也正是许多传统七夕乞巧习俗活动之所以显得非常美妙生动，充满诗情画意的真正原因所在。

（题图：《吴友如画宝》中的织女）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